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虞宁宁 / 著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

刘海峰 /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教会大学招生 考试研究



第一章 绪 论

传承西方通识教育理念，融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取得了出色的办学成果。教会大学有全国公认的优势特色学科，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林学，文华大学的图书馆学，沪江大学的商学，东吴大学的法学，燕京大学的新闻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学，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的医学以及圣约翰大学的外国语言学等。近代中国的新式人才，曾毕业或受教于教会大学的，更是不可胜数。仅以圣约翰大学为例，就有活跃在近代中国内政外交舞台上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医学界的颜福庆、刁信德、牛惠霖、牛惠生；实业界的刘鸿生、刘吉生、荣毅仁；金融界的周作民；教育界的陈鹤琴；科技界的吴绂之、徐凤石；宗教界的丁光训、汤忠谟，以及其他如宋子文、林语堂、贝聿铭、张爱玲、邹韬奋等，不胜枚举^①。接受了西方正规大学教育和规范科研训练的教会大学毕业生，不仅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传播者，也成为中国诸多科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以现代教育而论，教会学校堪称中国新教育的前驱之一^②。

教会大学的成功办学，肯定与其科学、民主、高效、人本的招生考试制度密切相关。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不仅担负着选拔深造之才的重任，反映着教会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也折射出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间的密切关系。因此，研究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探寻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历史变迁，明确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理念和招生考试运作模式，既可加深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办学特色、人才选拔和培养规律的认识，又对当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① 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6页。

② 《教会学校：中国新教育前驱》，《申报》1937年5月19日。

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研究缘起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是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世俗科学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带有鲜明的外国文化和宗教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看似格格不入,但教会大学却培养出大批具有爱国思想、牺牲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通识精英人才,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研究选择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作为研究主题,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对其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招生考试作为教会大学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承担着选拔优秀生源的重任,同时又发挥着学业诊断功能,为大学人才培养的后续环节提供因材施教的客观依据。教会大学移植欧美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以选拔身心和谐发展的全优人才为目标,注重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群、能全方位的综合评价,其中对学生德的评价又自然而然地渗透着基督教的品性标准。经过审核学生的入学志愿书、品性调查表、中学成绩表、入学保证书等多项申请材料,通过大学自主命题的入学考试,以及西医全面的体格检查,教会大学将入学意愿强烈、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具有深造潜质的学生选入大学,接受精英高等教育。值得关注的是,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在近代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地线性发展的,而是历经了各种改革。办学环境的不断变化使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从最初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和教育基督徒子女扩展,转变为培养、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所需的各种领袖人才和高等专门人才,甚至普通职业人才,但通识性精英人才始终是教会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和主体。教会大学适应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转换,改革和完善招生考试制度,在严峻的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中秉持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坚持以质取胜,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成为其成功办学的重要保障。

招生考试服务于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人才选拔又是大学人才培养的第一环节,所以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人才选拔质量的改进,而科学、民主、高效、人本的招生考试运作模式则有助于提高人才选拔质量。因此,当我们关注并研究教会大学为何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时,还是应当从其人才培养的开端,即人才选拔开始,顺次梳理教会大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这样才能把握其全貌,探寻其规律,并为当前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提供

借鉴。

第二,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传承并实践的通识教育理念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影响显著。

通识教育是欧美大学秉持的重要理念,当教会大学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之时,也承袭了欧美传统文科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大学存在的价值不是为了贩卖知识、技术,教授单一的技能,造就所谓的专家,而是要提供广博的基础,培养领袖精英,拓展心灵,完善人格^①。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虽然首先倡导并积极推进现代大学分科教学,但其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却始终秉持通识教育理念,以培养具有基督化人格的通识精英为核心,注重对考生品行的考核,如博爱、牺牲、服务的基督精神。在国家处于艰难的抗战时期,教会大学又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广泛招收爱国学生,引导学生保持抗战爱国的民族气节。在招生考试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上,教会大学树立了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以入学考试的量化特征而言,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虽然能够对学生特定时期的学术水平作出客观的测量、评价和比较,但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不能对学生的学习意愿、学习态度、品行状况和适应能力作出测量。因此,教会大学招生考试通过设立基本、综合的考试科目测查学生的通识基础和专业水平,通过智力测验了解学生的学术性向、智力水平和适应能力,通过审核学生的中学成绩表、参加社团服务情况、品性调查表、入学志愿书等质性材料评价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其他综合素养,为大学选拔出通识精英,使其接受更高层次的大学教育。

当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在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之间摇摆不时,教会大学坚持以培养通才为核心,并围绕其人才培养目标改革、完善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探寻通识教育理念对教会大学人才选拔的影响,可以更清晰地认识通识教育理念如何通过招生考试深化到教会大学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对其人才培养产生重要影响,并进而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影响。

第三,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考试制度建设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发展正好与中国近代考试制度的转型和重构期相契

^① Yale University, The Yale Report of 1828, Hezekiah Howe, 1828.

合。1905年，中国历史悠久的融选官和教育为一体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了对中国考试制度最直接的冲击，宣告了中国历史上考“官”时代的终结，使考试的重心由考“官”转向考“学”^①。新式学校考试制度和文官选拔制度在清末民初的教育与考试改革中逐渐确立与发展起来，实现了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和重构。中国近代学校教育考试的创立与发展，不是在废科举后陡然而生的，而是在废科举之前的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中已经存在并缓慢发展起来的，科举废除后，源于西方的新式学校考试制度受到重视，影响力陡然增加。至1920年代，教会大学经过早期的探索，已经仿照西方模式建立起相对规范的现代学校考试制度，形成了从入学考试到学业考试再到毕业考试的完整环节。在大学招生考试方面，采取了综合多元的评价标准，确立了推荐免试生、普通正式生、转学生、试读生、特别生等多元化的招生录取方式，并通过颁布中等课程要求和“承认中学”等方式影响和引导中等教育的发展，对民国初期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建设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由自主招考到全国统考，再到单独招考、联合招考，不断改革、探索；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也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不断调整，但却始终保持相对自主的招生模式，成为中国近代教育考试制度发展中宝贵的遗存，发挥独特作用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近代考试制度的内容，参与并见证了其改革发展的历程。

第四，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是基督教文化、西方世俗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多元共存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教会大学扮演着沟通中西方文化的特殊角色，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近代转型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②。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更是受到欧美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显著影响。美国大学招生时采用的证书录取制度、认可中学制度，以及签订入学契约书等规定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中都有完整的再现。随着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逐步受到中国行政法规的影响和限制，以及中国国立大学快速崛起形成的竞争局面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对大学招生考试改革的诉求，教会大学招

^① 张亚群：《从考“官”到考“学”——废科举后考试文化的变革与传承》，《书屋》2005年第1期。

^② 马敏：《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章开沅：《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生考试既没有完全沿着欧美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发展轨迹前行,也没有与国立大学的招生考试一致,而是保持和发展了自身原有的招生特色。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通过对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发展演变的深入剖析,当可以探寻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升沉消长的历史轨迹。

第五,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可以为当前高考改革,尤其是大学自主招生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当前高考改革面临许多困境,其难度和复杂性超出想象,大学自主招生改革更是处在效率与公平的风口浪尖之上,而教会大学始终实行自主招生考试,积累了丰富的自主招考经验。虽然教会大学已成历史,但作为高等教育机构,教会大学与当代高校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具有遵循教育和考试规律的基本共性。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质疑当代大学为何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时,纷纷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的高考制度;但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培养出大批通识精英人才,却又极少有人对其招生考试进行系统研究。

2010年7月底,我国正式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要“完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综合素质和能力”。在招生考试改革中实行“多元录取”、优秀学生“推荐录取”、特殊人才“破格录取”等措施^①。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中,实名推荐、多元招生、推荐免试、联合招考等措施都曾普遍实施且有良好的运作模式。因此,对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进行深入、系统、完整的梳理和分析,充分挖掘历史经验,探寻近代教会大学的人才观和考试观,明晰影响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各种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理清问题的发展脉络,把握问题产生的实质,对客观分析当前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措施的适宜性,提高招生考试改革的有效性,以及充分发挥高校招生考试评价、选拔功能和对中等教育的引导功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招生考试体现着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管理理念,与大学培养人才的基本职能密切相连。当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曾认为,从留美学生中可以看出一种历史动向,此种动向会形成当时令人无

^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7月。

法相信的发展^①。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由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推而及之的中国近代大学招生考试的演变规律，也同样可以预测中国高校招生考试的发展动向。

二、研究意义

教会大学招生考试虽已成为历史，但它为中国近代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作出过积极贡献；同时作为大学人才选拔活动，其遵循教育和考试的基本规律，又与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时期的高校招生考试有相通之处。因此，研究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首先，从历史角度而言，占中国近代大学 1/3 的教会大学，其人才选拔活动既构成中国近代高校招生考试的重要内容，也对中国近代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建设和中等教育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此，研究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既可以开拓教会大学新的研究领域，丰富教会大学史的相关研究，也可以显著扩充中国近代考试史的研究。

招生与大学的教学活动紧密相连，入学考试又是招生所采用的有效方式。任何扩展办学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的改革都必然涉及招生或入学考试的变化。招生规模的扩大、申请资格的变化以及入学考试标准的提高都是大学发展的具体表征。招生考试活动是教会大学教学管理活动的重要常规内容，是人才培养过程的开端，是学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环节。已有的研究教会大学的文献中，对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系统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梳理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历史变迁，总结其特点，探寻其规律，可使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成果更加完善，而教会大学史研究“不仅对于近代教育发展的研究极具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史、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②。

另外，有关中国考试史的研究也主要是以科举研究为主的中国古代考试史和以高考与自考研究为主的中国当代考试史^③，已有文献中对中国近代教育考试的研究屈指可数，且多注重于理论探究、评价指标的确立，技术层面

①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② 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章开沅：《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6页。

③ 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前言。

的操作以及应时的考试指导,对中国近代大学丰富的考试招生实践缺少关注。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考试历史的重要转折期,教会大学又是近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研究虽只是中国近代教育考试研究的部分对象,却能够在充实近代考试史研究的同时,为后续研究的开展作一些铺垫。

其次,从理论角度而言,探讨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运作模式,运用考试理论和高等教育理论对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制度进行剖析,总结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特点和规律,可深化对教会大学办学特色的理论研究,丰富有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

本研究尝试通过文献分析,从西方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出发,解析教会大学丰富的招生考试实践活动,探寻在近代中国复杂多元的文化、教育背景中,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即其如何将自身所代表的西方通识教育理念、教学管理方式更好地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教育传统相结合,达到和谐互动,共同促进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发展。

再次,从现实角度而言,探讨教会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制度设计理念、考试运作模式、招生考试原则和招考基本规律,对当前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大学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招生入学考试与学业考试、毕业考试相互联系,共同组成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三重保障。招生考试负责从中学及社会上选拔适宜的人才进入大学;学业考试对学生在校的学习状况进行过程性评价;毕业考试则保证大学毕业生在进入社会服务之际已经确实具备了相应的资格。招生考试的功能重在淘汰,其他两种考试重在评价,虽性质不同,但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成功运作得益于大学享有的自主权利,坚定的办学理念,准确的办学定位,明确的招考原则和科学民主的运作、管理。大学的自主、自信、自律是实行自主招考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近代教会大学自主招考的成功经验,也是当前实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近年来,我国高考制度历经变革,依然问题重重,反映出我们对大学招生考试的性质和发展逻辑的认识还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在大学招生考试面临新的调整和发展时,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思考和探索大学招生考试的本质和发展特征。“如果没有对大学的发展和悠久传统的深入认识,是不可

能获得解决大学问题的真正有效的方法的。”^① 因此，要对今天的高校招生考试有更明晰的认识，并探索新的改革之路，必须对历史上大学招生考试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这样才能借鉴其优良传统，克服其弊端，使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当前高校改革发展的精神财富，从而避免在改革中走弯路，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

三、相关概念界定

（一）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泛指由宗教组织或人士创办的具有宗教色彩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教会大学的外延有所不同，但它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有宗教色彩；其二是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大学的基本职能。

本文所研究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特指晚清民国时期由外国教会组织在中国创立或参与经营的、以基督精神作为教育宗旨的高等教育机构。按照大的宗教派别，可分为天主教大学和基督教大学。这与学者吴梓明对教会大学和基督教大学概念的论述略有差异。他认为，教会大学是指直接由教会管辖或办理的大学；而基督教大学至少包括三种不同办学形式的大学：一是由教会个别宗派直接管辖的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杭州之江大学；二是由多个宗派或联合教会组织协办的大学，如北平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三是由基督教人士创办而不直属任何宗派或教会组织的大学，如广州岭南大学^②。本文研究的教会大学包括以上各种办学形式。

以基督精神作为教育宗旨是教会大学的自我界定。福建协和大学规定，大学以仁爱、牺牲和服务的精神向中国年轻人提供大学水平的教育^③。齐鲁大学董事会 1928 年通过的办学目标为：培养学生具有仁爱、牺牲和服务的精神；造就学生具备最崇高的品格；提供专业训练，满足社会需要。华中大

^① Ridder-Symoens H. De (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ies in Europe (Vol. I):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1.

^② 《吴梓明记岭南大学建校特色》，朱有曦、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61 页。

^③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陈建明、姜源译，珠海出版社，1999 年，第 48 页。

学确立的宗旨是在基督教的仁爱和牺牲的基础上,怀着把上帝之国以及永久的和平带给人间的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来发展人的智能。之江大学是执行国民政府总的教育目标,同时以仁爱、牺牲和服务的基督徒精神培养具有崇高品质、智能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来适应社会的需要^①。岭南大学虽不属于任何教派之性质,但仍一贯以基督精神为教育宗旨^②。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对大学设立标准的变革,使得“大学”概念的外延不断发生变化,1912年公布的《大学令》规定,文理二科并设;文科兼法商二科;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或一科三种情况均可称为大学^③。1917年又规定单设一科也可称为大学^④。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将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⑤。按照1929年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的规定,原本校名可冠以大学称谓的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等教会大学都因不符合设立三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的标准,而在立案时改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本研究也采用以上划分方式,将所有具备两个学院以上的教会大学和学院统称为教会大学,共计16所,包括13所基督教大学和3所天主教大学,即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金陵大学(Nanking University)、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 Chung University)、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华南女子大学(Hwa Nan College)、辅仁大学(Fu Jen

①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② 吴梓明:《记岭南大学建校特色》,朱有瓚、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63页。

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02页。

④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663页。

⑤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16页。

Catholic University)、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和天津工商大学(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et Commerciales)。由于教会大学自身的历史变迁以及不同时期政府政策的变更,各教会大学的校名多有更迭,本研究在行文中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采用较多使用的校名,如金陵女子大学多使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名;华南女子大学多使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名等;第二,尊重档案史料中的用法,在引用时,对档案史料中的校名称谓,除特别需要外,不作变更。

(二) 招生模式

招生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为实现人才培养职能而实施的人才选拔活动。招生模式则是指大学在人才选拔活动中,基于特定的招生政策和招考理念所形成的入学方式、评价指标、录取标准等的综合。按照组织招生活动的机构和形式不同,大学招生可分为国家统一招生和大学自主招生两种模式,其中大学自主招生又可细分为单独招生、联合招生和委托招生三种形式;按照具体评价指标的差异,大学招生可分为证书招生、推荐招生、考试招生 and 特别招生等具体方式。就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而言,其主要的招生模式是大学自主实施的推荐加考试的混合型招生模式。

(三) 大学入学考试

大学入学考试,是指大学为选拔合适生源、保证招生质量而实施的教育测量与评价活动。它具有工具和活动双重属性。大学入学考试与大学招生考试联系紧密但又有所区别。大学招生考试是指大学招生和大学入学考试的综合,是“大学考试与招生取才的整个运作方式和过程。包括考试方式、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时间、招生入学的途径、招生的组织机构及运作、录取标准和分发方式等内容”^①。它是指大学主要以入学考试为依托实施的人才选拔活动。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招收新生必须经入学试验,使入学考试逐渐成为大学招生必经的环节,考试录取成为大学录取新生的主要方式,入学考试与招生的关系愈加紧密,几成一体。

由于大学越来越多地借助入学考试选拔新生,考试录取的学生在大学新生中占绝对比例,在学生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入学考试成绩甚至成为录

^① 杨李娜:《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取与否的决定因素,这使得二者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大学招生考试逐渐成为固定搭配且频繁使用的专业用语,成为特指大学的招生活动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大学入学考试活动的综合。本研究的主题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即对近代教会大学的招生和入学考试活动进行综合研究,主要涉及招生考试的历史变迁、招考政策、招考理念、招考原则、入学考试的组织实施、考试科目及考试内容等。

四、文献综述

从招生考试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这一主题所取得的成果可谓屈指可数。只有一篇期刊文章《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招生特点》将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剖析教会大学的自主招生与单独考试、考生的宗教背景、招生质量以及招考地域等七个方面的显著特点^①。其他与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中国近代高校招生考试为主题的研究;二是以教会大学为主题的研究。

(一) 中国近代高校招生考试研究

对中国近代高校招生考试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考试学理论,对近代高校招生考试政策、考试程序、考试内容和形式、考试科目、考试法规、人才选拔效率以及自主招生考试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其经验和不足,进而提出对当前高考改革的借鉴意义;二是纯粹从历史角度梳理近代高校招生考试的发展变迁。

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前一方面。薛成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高校招生考试研究》中指出,近代中国的招生考试经历了从统一到分散再到统一然后又分散的过程,单独招考和统一招考是近代高校招生考试的两种基本模式,各有自己的长处和历史适应性;同时,近代高校招生考试的发展始终围绕两大矛盾,即坚持严格入学标准与放宽入学标准的矛盾、招考统一与招考自主的矛盾,并由此表现出近代中国高校招生考试民主、科学、开放、实用四个基本特征^②。房列曙所著的《民国时期高校考试制度的历史考察》,总结出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考试制度发展的表现是完善入学考试、加强平时考

^① 巨玉霞、张亚群:《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招生特点》,《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5期。

^② 薛成龙:《近代中国高校招生考试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

试、重视考察能力和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①。张亚群所著的《从单独招考到统一招考——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变革的启示》论述了民国时期大学招考形式的变化,指出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是中国近代高校招考的重要变革阶段,既留下了高校单独招考的经验,也昭示了统一招考的历史必然性^②。张学强、彭慧丽所著的《民国时期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探析——兼论对完善我国当代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启示》一文认为,民国初期高校自主招生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教育体制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招生权下移。民国高校自主招生的发展经历了完全自主招生、自主招生逐渐被统一招生取代和多元招考方式并存三个阶段,并伴随着政府逐渐完善自主招生制度的进程。其积极的影响是使学校的招生与教学更加具有灵活性,同时还可以让学校不拘一格录取一部分特长生,而当代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完善则需国家制定相应的标准,并提高自主招生的公平性和公正性^③。

另外,彭慧丽所著的《民国时期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研究(1912—1949)》^④和杨李娜所著的《民国时期的大学招考制度及其影响》^⑤,都对民国时期大学招考制度的内容、特征、模式以及招生方式、招生机构进行了研究。这些成果有益于拓宽本研究的思考维度,提高研究的理论水平。

韩斌所著的论文《民国时期大学入学数学考试研究》,从历史背景、民国建立后学制与课程标准对考试内容的影响、招生考试的政策环境,以及具体试题内容等方面分析了近现代数学试题的差异,总结了近代大学数学入学试题不同阶段的命题方式,以及伴随考试出现的问题,最后归纳出对当前考试的借鉴意义^⑥。论文虽然以国立大学的入学试题为研究样本,但仍为本研究需进行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① 房列曙:《民国时期高校考试制度的历史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② 张亚群:《从单独招考到统一招考——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变革的启示》,《中国教师》2005年第6期。

③ 张学强、彭慧丽:《民国时期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探析——兼论对完善我国当代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④ 彭慧丽:《民国时期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研究(1912—1949)》,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⑤ 杨李娜:《民国时期的大学招考制度及其影响》,《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⑥ 韩斌:《民国时期大学入学数学考试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值得关注的文献还有胡向东所著的《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该著作分析了民国时期考试制度转型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思想基础，论证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文官考试制度和教育考试制度分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只是该著作更多泼墨于中国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的构建与发展^①。另外还有一些相关文献，对民国招生考试有涉及，在此不一一赘述^②。

对中国近代高校招生考试的纯粹历史梳理主要囊括在考试发展史和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等著作中，代表性的有杨学为、朱仇美和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和刘海峰等著的《中国考试发展史》以及杨学为总主编的《中国考试通史》等^③。这些研究成果对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考试史料，有利于笔者把握近代中国考试发展的整体脉络。

（二）教会大学史相关研究

从广义上讲，所有与教会大学相关的研究都可称为教会大学史研究；从狭义上讲，可以将有关教会大学群体和个体的发展史研究归为一类，与教会大学人物研究、教学管理研究、校园文化研究等并列。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国内学术界对教会教育展开了广泛研究，曾被标为“敌伪”档案的教会学校原始档案被公开并可供查阅以用于学术研究；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传统的文化侵略研究模式逐渐退出中心舞台。借助教会大学的原始档案、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对教会大学的报道，以及校友的回忆文章，教会大学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一些学者整理出版的史料集，为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其中也涉及入学手续、招考简章、大学年度报告以及学生入学方式等信息，对本研究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李楚材所辑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陈学恂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朱有璘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以及舒新城所编《中

① 胡向东：《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 高耀明：《民国时期高校招生制度述略》，《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吴芬：《中国早期研究生教育研究（1902～1949）》，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肖娟群：《我国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历史考察与现状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宋玉霞：《民国前期教育考试变革之争——基于民国教育期刊的分析》，《中国考试》2009年第4期；吴江：《民国时期的大学入学考试》，《钟山风雨》2007年第5期。

③ 杨学为、朱仇美、张海鹏：《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92年；刘海峰，等：《中国考试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杨学为总主编：《中国考试通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国近代教育史资料》^①。此外，还有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所编的《金陵大学史料集》^②，王国平等学者所编的《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③，以及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苏州大学上海校友会合编的《东吴春秋：东吴大学建校百十周年纪念》等^④。《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等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⑤。

除上述史料外，有关教会大学史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教会大学群体和个体发展史研究。迄今，有关教会大学创办和发展历史的研究最为集中，已有两套丛书和众多单册专著出版，在系统梳理教会大学创立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其招生考试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美国学者杰西·格·卢茨所著，曾钜生翻译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高时良所著的《教会学校史》、吴洪成所著的《中国教会教育史》，以及刘家峰、刘天路所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等著作从整体角度梳理了教会大学的发展历史，对特殊历史时期教会大学应对学校发展的困境，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作了深入剖析，其中招生考试改革作为教会大学教学管理制度的完善举措有所涉及^⑥。珠海出版社出版的教会大学校

①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②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 王国平，等编：《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 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苏州大学上海校友会：《东吴春秋：东吴大学建校百十周年纪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1、3、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990年、1994年；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

⑥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高时良：《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吴洪成：《中国教会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

史丛书,皆系外国学者所著,国内学者翻译,书中大量史料来自教会大学的亲历者,许多是国内无法得到的珍贵资料;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丛书是国内学者所著,其侧重点在于以大量直观的图片展现教会大学的历史发展。两套丛书的共同特点是对教会大学发展史进行简略的全景式扫描,而不是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①。

惠世如主编的《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一书对华中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抗战期间的办学状况分别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可为分析这一时期内迁教会大学的招生策略提供背景资料^②。

近年来有国内学者在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单所教会大学校史,运用高等教育理论对教会大学的创立、发展、办学特色、管理模式、学生运动以及宗教教育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熊月之、周武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将圣约翰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作为学校宽进严出教学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③;另外还有徐以骅主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1879—1952》^④。徐乃乾编著的《北京辅仁大学校史 1925—1952》以各系系史为重点,通过对各系历史沿革、课程设置和办学特色的论述,展现学校的教学特色,其中院系的开设背景、历史沿革和办学特色都会对学校的招

① 珠海出版社出版的丛书:柯约翰:《华中大学》,马敏、叶桦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队克勋:《之江大学》,刘家峰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秦和平、何启浩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陈建明、姜源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杨天宏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文乃史:《东吴大学》,王国平、杨木武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张安明、刘祖芬:《江汉县华林——华中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王国平:《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徐以骅、韩信昌:《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谢必震:《香飘魏歧村——福建协和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张丽萍:《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孙海英:《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② 惠世如:《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③ 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 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生产生影响^①。与辅仁大学相关的文献还有《北京辅仁大学创办史：美国本笃会在中国 1923—1933》和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辑印行的《辅仁往事》系列专辑^②。

张宪文主编的《金陵大学史》介绍了金陵大学初创和发展、文理农三学院、校风与校园生活、金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最后的合并与调整^③。相关的研究著作还有王立诚所著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谢必震所著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福建协和大学》，张连红主编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史》，陈国钦、袁征所著的《新史学：瞬息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以及王国平所著的《东吴大学简史》等^④。

除了专门的教会大学校史著作，众多有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整体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中也有专章论述教会大学的兴起、发展以至消亡的历史变迁过程，并对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进行理论探讨。刘少雪所著的《中国大学教育

① 徐乃乾主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 1925—195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② Jerome Oetgen：《北京辅仁大学创办史：美国本笃会在中国（1923—1933）》，张琰译，辅仁大学出版社（台北），2001 年；辅仁大学校友会，《辅仁往事（1～5 辑）》，辅仁大学校友会，2006～2010 年。

③ 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④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谢必震：《教会大学在中国：福建协和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张连红：《金陵女子大学校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陈国钦、袁征：《新史学：瞬息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王国平：《东吴大学简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年；Fenn, William P.,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震旦大学校友会编：《震旦大学建校百年纪念》，震旦大学校友会，2002 年；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1888—1988）》，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孙建秋：《金陵女大 1915—1951：金陵女儿图片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汪文汉：《华中师范大学校史 1903—1993》，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大德是钦：记忆深处的福建协和大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年；汪征鲁：《福建师范大学校史（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年；李瑞明：《南国凤凰：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黄新宪：《从华南女子大学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对旧中国一所著名教会女子大学的考察》，《教育科学》1990 年第 3 期；邵彦：《非基督教运动前后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发展比较》，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